

让验车改革擦出“服务火花”

验车新规即将于9月1日落地。你的车到底应该几年一检验？别急，打开公安部交通安全微发布的微信公众号，点击“车检计算器”，输入你的车型等条件，答案立刻揭晓。别小看小小的“车检计算器”，这个借助新媒体平台的便民设置，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改革碰撞出的“服务火花”。

盘点长期被人们诟病的验车难顽疾，验车机构没有真正定位于便民服务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板着脸高高在上，任检验车辆排成长龙，车虫叫卖“加塞代验”的生意导致秩序混乱不堪，检验机构甚至变着法赚取调整灯光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。好端端把正常车辆检验异化成一堆“权力肥

肉”，百姓验车难反倒成了某些人和机构发不义之财的盛宴。

正因为此，本次验车改革，主管部门拿出大刀阔斧的勇气，简政放权，割除利益粘连，使政府部门、检验机构、检测市场各归其位。政府部门就是管规则制定、服务百姓；检验机构就是要公正检测、不得谋私；检测市场就是要放开门槛、充分竞争。如此，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才能碰撞出“服务火花”，让百姓从验车改革中真正受益。

验车改革要想更好地服务车主，各省份交管部门还要狠抓落实，不能让好政策在“最后一公里”因为落实不力打折扣。例如，地方交管部门应切实做好

机动车异地检测的落实。因为必须在建立全省统一机动车检验监管平台的基础上，才能推行省内异地检验。公安部正组织试点应用全国统一的检验监管软件，逐步推行跨省份异地检验。各地交管部门应当抓紧建好数据平台，为省内实现异地检验铺平技术通道。

验车新规是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的体现。好政策在落实环节一定要抓细、抓实。各地交管部门应当把验车改革的落实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抓手，抓好窗口人员服务态度的转变，搞好“车检计算器”这样的便民服务细节，让广大车主发自内心的为验车改革“点赞”。

新华社记者南辰

●热点聚焦

校车成公厕 教育部门别旁观

浙江温岭市有个芷胜庄村，齐刷刷停了52辆崭新校车，且停了近1年。车子是安徽驻台州商会投资约2000万元购置的，原计划在温岭成立一家校车公司，以解决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接送难题，却因市场需求不足而校车被“撂荒”，甚至成了“公厕”。（8月28日新华社）

近年来，校车安全事故频发，为解决校车安全问题，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于2012年4月发布。一时之间，社会各界都对校车配置有了极大热情。

或许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安徽驻台州商会才购置了这些校车。本来，这是一件好事，然而好事没有办好。安徽驻台州商会在没有完成合法程序的背景下，就买了车；当地教育部门则以没有市场需求为由，拒绝对这些校车进行审批。于是，校车被“撂荒”，甚至成了“公厕”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就眼下而言，此事仍无真相，是非没有定论。商会负责人觉得自己很委屈，一开始得到教育部门的支持与鼓励，所以先买了车，教育部门却不批准申请；当地教育部门则认为错在商会，因为在商会买车前一两个月，他们就告知对方，市场需求不够，成立校车公司不可行。如此扑朔迷离的事情，谁也无法先行站队，到底孰是孰非，仍需等待真相方可评判。

但无论是非，本该成为呵护学生安全的崭新校车被闲置很是可惜。在如此现实语境下，收拾烂摊子显然最为紧迫。那么该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呢？商会当然旁无责，但当地教育部门也不能作壁上观。正如一些网友所言，“这么好的校车停在村里很浪费，挺可惜的。不如跳出温岭，去一些运力短缺的地区进行市场调研，尝试合作。”当地教育部门完全可以发挥部门优势，帮助商会与其他运力短缺的地区联系，让这些校车尽快派上用场。毕竟，在统筹协调合理配置资源方面，教育部门有着商会无可比拟的部门优势。龙敏飞

甬上辣评

“因为我毕竟要吃饱肚子去工作呀，肚子不搞饱，怎么去工作，所以我第一必须考虑生存问题。”湖北咸宁赤壁市一家服装厂每年花费数万元，把产品送到湖北省质监局纤维检验局检测，检验合格后，咸宁市质监部门却依然要对他们的产品进行定检，并收取数千元的检测费。为什么要滥收费？咸宁质监局局长张志宏面对采访，甩出了如上“生存论”。

（8月28日中国广播网）



漫画 毕传国

“肚子不饱”不能成滥收费理由

确实没有想到，权力滥用还有如此辛酸的理由——要先填饱肚子。言下之意，如果不滥收费，就无法养活执法的人，无法开展正常工作，所以滥收费是一种必然，滥收费是一种权力生存法则。如果这样的逻辑可以成立，权力的使用岂不是与要流氓无异？

一旦权力滥用，面对饥渴的权力，企业就将遭遇非制度化生存。本来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，企业只要安分守己地生产和经营，它们的发展和成绩就基本上可以预期，毕竟经济生活已制度化，企业发展也有其规律性。遗憾的是，权力常常因为吃不饱而被滥用——这种吃不饱有可能是真吃不饱，有可能是太贪婪，但不管怎样，既然是滥用就意味着打破规则，越过界限，对企业进

行制度之外的挤压与收费，这对企业来说当然苦不堪言——明知这是违规行为，但不得不屈服。更要命的是，企业将失去判断的依据和稳定的安全感，会时时刻刻心惊胆战，不知权力什么时候又饿起来。

如此“生存论”，反映了权力的非制度化生存。一方面，一些机构工作稳定、福利诱人，成为掌权者安置亲近人员的“福利所”，导致人员不断超标；另一方面，在一些地方，权力没有戴上紧箍，谋取利益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。结果，在养活自己的过程中，权力滥用有时不可避免。

无论是哪一种非制度化生存，最终受害的除了具体的企业和单位，还有制度本身。当权力滥用可以拿生存当理由时，权力对于制度的敬畏也就所剩无几。所谓敬

畏，不是需要时才敬畏，不需要时当儿戏，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与自我警惕。当制度不受待见时，不仅权力不把制度当一回事，一般人也会对制度失去信仰：遇事事情，人们不再相信制度；出现问题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公关。最终，制度可能沦为纸面的规定，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非制度化的不稳定中。于是，各种问题和乱象便会层出不穷。

想解决这种权力滥用的非制度化状态，就必须把权力装在制度的笼子里。否则，即便把一个抛出“生存论”的局长骂得要死，这些单位的生存困境还在，罚款创收的思维还在，权力滥用的动力还在，企业被权力上下其手的事实还在。这显然不能彻底改变什么。李劲强

社会观察

“熊孩子”折射生命教育缺失

因为嫌楼外施工的电钻声太吵，贵阳一名正在8楼屋内看动画片的10岁男孩，一气之下用小刀子将施工者下方的安全绳割断，致使其悬在半空动弹不得，贵阳观山湖消防大队紧急出动后才将人安全救下。（8月28日《贵州都市报》）

看到这样一则新闻，许多人会认为这个男孩就是“熊孩子”，只为看动画片时被楼外噪音骚扰，就将工人的安全绳割断，确实有些偏激。幸运的是，该工人没有坠楼。诚然，男孩的父亲已对工人道歉，并购买了新的安全绳，但是，该事件背后留给我们的反思却刚刚开始。

对于一个10岁的男孩，许多人会想到是因为父母管教不严，最终导致了惊险一幕的发生。比如，在去年重庆女童高楼

抛下婴儿事件中，很多人也将斥责之声指向其父母。毫无疑问，孩子的父母肯定有责任，“子不教父之过”，正是他们疏于管教，使孩子犯错的概率大大增加。除此以外，对于这些孩子而言，在学习生活中还缺少一种教育方式，那就是生命教育。如果孩子们对于生命缺乏应有的认知和了解，心智不成熟的他们，也就不可能在内心深处珍视宝贵的生命，而会将威胁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看成了无足轻重的举动。

其实，在西方国家，生命教育一直都被看成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。比如，在美国，生命教育是以死亡教育的形式出现的，力求让孩子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生命，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目前，美国所有的中小学都开设了生命教育课程，为推广生命教育，

甚至成立了各种专业协会，推动生命教育课程在深度和广度上更进一步。

反观国内，在这方面却捉襟见肘，我们只是在强调孩子们如何学习，如何提高成绩，却鲜有关于生命教育的课程设置。如此之下，缺乏生命教育的氛围和环境，孩子们不会对生命保持尊重和谦抑，甚至在少数孩子内心形成了偏执的观念，暴力血腥的行为也常常出现。

基于此，对于孩子，不管是家庭，还是学校，抑或是社会环境，都应该将生命教育灌输到孩子内心深处，让他们认识到生命的宝贵之处。通过这种教育方式，可以更好地引导他们尊重生命、尊重他人，在做事的时候，多想想后果，而不是作出一些忽略他人生命的举动。刘建国



现在外出自驾游的人越来越多，但在地吃交到交警罚单，处理不及时就麻烦了。民警介绍说，“电子警察”违法信息已全国联网，可在车辆注册登记地处理。比较麻烦的是交警现场处罚，必须到当地交警队处理，无法在网上办理。（8月28日《宁波日报》）

点评：“电子警察”违法信息已全国联网，想必交警现场处罚违法信息全国联网也不存在技术问题，那为什么没有联网呢？看来是非不能，而不为也。联网或许麻烦，但基于便民的服务理念，还是尽早开通为好。

云南锡业集团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雷毅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收受贿赂2910余万元。雷毅自以为有“牢不可破”的“圈子”，可笑的是，在他出事时，昔日呼号拥簇哥们儿义气的“座上宾”抢着检举揭发他。（8月28日《河南商报》）

点评：对于行贿者来说，是铁打的宴席，流水的官员，结交的不是宴席上的人，而是他掌握的权力。至于义气，在出事时，当然是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

四川蓬安县石孔乡大货车司机伍英雄两次被讹仍坚持救人。1998年，他在广东打工，路过救人却被咬定是肇事者，赔了7000元。2009年，他救人再次被讹，幸被目击者证明清白。今年7月26日，在石孔乡碰上车祸，他依旧果断出手救人。（8月28日《华西都市报》）

点评：每一次对正义的伤害，行善的道路上都会多一座高山，伍英雄攀过两次高山仍不忘初心，可谓人如其名。但让人担心的是，他还能攀过几座高山，又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韧性？这件事会成为新闻，本身就说明了许多问题。